

東方雜誌

第十二號

第十四卷

東方雜誌

第四十一卷 第二十一號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行

戰後歐洲的政治傾向

潘楚基(一)

殷商拓地朝鮮考

蔣逸雪(四一)

蘇聯的財政制度

徐日琨(一一)

趙匡胤的得國及其與張永德李重進

論中英兩國之造人

儲安平(一八)

的關係

鄧廣銘(四六)

訴訟程序之簡化

桂裕(二三)

第二次歐洲大戰史略

石地(四九)

從生命本質的直觀中談戰後社會改

波羅奈城與鹿野苑

李樹青(五五)

造

程懋珪(二五)

枚乘詩辨

張長弓(五八)

水與人類的健康

劉遐疊譯(二九)

方望溪文論

劉夢秋(六二)

何謂生霸死霸

岑仲勉(三二)

戰後歐洲的政治傾向

潘楚基

一 前言

英國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拉斯基氏在六月十七日的紐約時報星期雜誌發表一文，推論現時的政治傾向，其中有下列幾段：

「……普通人已在到處抬頭，要求取得每一個社會至今拒絕給予他的地位。」

「每一個標識都暗示着在希特拉主義與日本軍閥推翻以後，整個歐洲及亞洲會放弛一種力量，其與傳統秩序的性質之不相容，有如資本家的需要與要求之不能與封建政權相容一樣。」

「此外，我想任何在傳統秩序範圍內的讓步都很難滿足要求的水準。差不多在每一個地方，對羣衆所作的讓步之最大部份會來得太遲，失掉了在五十年以前也許能夠擋阻根本改革之需要的文雅的外表。無疑，運動發展不會是一律的。既得權利者在勝利而富有的國家如美國，能夠維持其權力，遠較在一個大受摧毀的國家如法國或意大利者爲長久。」

「因爲那個失敗的結果，是褫奪那些一向慣於行使權力的人們對羣衆的心理控制，那些羣衆以往是尊敬它的。」

「……就我看來，任何努力以保存一九三九年我們的文明所基的假定是很難成功的。第一，爲了重建這些爲德意所蹂躪的國家，在計劃重建及決定其實行之優先程序兩方面，都須要國家權力的直接干預。」

「當然，以上所說，在失敗國家及其衛星國家最爲真實，但是在勝利的國家，也會有一個長時間不能回復英美工商業所熱烈主

張的「自由企業」。

「因爲任何一國想要廢除戰時所必要的經濟控制而不冒引起工業混亂的危險，那是不可能的，而工業混亂會很快地進入一個社會混亂。與這個相聯繫的是大批羣衆的失業，而現在大家都知道在大批羣衆失業的地方，想要保存政治的民主，除非使用國家權力之強烈的干預沒有可能。」

「……全世界正在左傾，以不可抵抗之勢左傾。我並不否認在革命的進程中，有這裏暫時停止或那裏發生反革命的可能性，但是我們所當對的問題，不能以傳統秩序的辦法解決，這個信念到處在增長中……」

惟年來高瞻遠矚之士莫不認歐洲的政治，甚至全世界的政治，是趨於左傾，拉氏特爲其中之一人而已。此種左傾的主要原因，概括起來，在客觀方面，爲戰爭的物質毀滅，使往日財產權關係與觀念發生動搖；戰後百廢待興，工作艱鉅，事實上非使用國家權力不易有效辦理；在主觀方面，爲人民羣衆對舊日統治階級喪失信任，加上民主國家所行若干「爲淵驅魚，爲叢驅雀」的錯誤政策，以及左派政黨的努力活動，於是左傾的洪流瀾漫全歐，大有逢者滅頂之勢。現在把歐洲國家最近幾個月的左傾情勢，摘要報告如次。

二 英國

英國雖然不是歐洲大陸的國家，但是我們通常稱之爲「歐洲國家」，所以戰後英國左傾的情勢，不能不稍加論述。

關於本年七月五日英國大選的結果及其意義，記者曾經撰述一次

通訊，寄回祖國發表。這裏只略述幾個要點：

英國這次的選舉，論爭焦點不是外交政策而是內國經濟政策；再明白一點，是私人企業的自由經營及政府統制與國營兩大主張之衝突。工黨主張國營英國的煤礦，動力，鋼鐵工業，內國的陸上與水上交通系統，英倫銀行，以及若干土地。此外，他們還要求政府統制住宅建築，繼續管理物價，監視獨佔事業，襄助輸出貿易，以及保證人民就業，增進社會安全。保守黨方面，一方痛罵這類主張為過激，並以工黨如果執政，將使全歐洲共產，且剝奪英國人的一切自由（連呼吸自由在內！）恫嚇選民，一面自己發表一些改良主張，作為「釜底抽薪」之計；再加以他們利用英國人的傳統民族性——穩健，以及邱吉爾的巨大聲望，自以為選舉獲勝，有如探囊取物。可是結果，保守黨卻遭到空前的慘敗，議席由三五八而降至一九五。

這次選舉結果，有兩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是工黨的勝利不是相對的而是絕對的。我們知道在一九二三年選舉後，工黨第一次得有機會組織內閣。但是他們在下院僅佔有一九一議席，所以組閣時不能不聯合自由黨，自由黨一動搖，工黨內閣隨即坍塌。在一九二九年的選舉中，工黨得有二八八議席，較之保守黨多得二十八議席，但是還沒有在全體中過半數，所以麥克唐納的第二屆內閣，仍是「不幸短命」。這次選舉，在六百四十席次中，工黨由原來的一六三議席而增至三百九十餘議席，顯然超過半數而有餘，今後即令其中有若干分子動搖，工黨的繼續執政五年是毫無問題的。在這五年當中，除非美國以最大的經濟力量，對英國勢迫利誘，使其右傾（如紐約時報可羅克氏之所主張），而工黨願意俯首就範，則工黨雖不見得能如阿特里所言「建立社會主義的不列顛」，但競選政綱一部份之實現是必然的。

第二，自由黨的主張，一向介於保守黨與工黨之間。在這次選舉時，自由黨人相信該黨可能增加席次，成為一個有力的第三黨，甚至可與勢均力敵的其他二黨之一組織聯合內閣，自居舉足輕重的地位。

可是自由黨也遭受了慘敗，原來的十八個議席僅能維持十一，而最重要的領袖如辛克萊與皮外芮治自身都免不了被淘汰。這可以看出太含混太不徹底的左右騎牆主義已為英國選民所摒棄。在另外一方面，英國選民的左傾，今日雖僅傾到工黨的「社會主義」，但英國共產黨所得的議席卻由一名而增至兩名。雖則英國共產黨所誇稱「我們的議席增加了一倍」似乎只是一句幽默話，但是如果我們想到美國國會中至今根本還沒有一個共產黨議員，則英國的這個政治趨勢，也值得我們相當注意。

紐約時報駐倫敦記者丹利耳氏說：「工黨的得勝代表政治傾向之一個深宏的與根本的改變。因為選票所趕出的不僅是一個政黨，而是一個階級。」這個看法是對的。

三 法國

法國的左傾運動，主要由社會黨及共產黨所構成，其中尤以共產黨為活躍。共產黨得勢的原因，據一年以前美國基督教科學警世報一篇長文的分析，為下列三者：

(一)俄國勝利所給予法國人民的強烈印象；

(二)法國最多數的政黨都渙散無組織，而共產黨的組織則極其健全；

(三)法國抵抗運動中共產黨分子參加之踴躍。

因為法國的抵抗運動，係以左傾分子為主體。所以借重抵抗運動而得勢的戴高樂將軍，不能不跟着也表現一些左傾的姿態。譬如一九四四年九月三日他在巴黎宣布，在法國戰後的政權之下，「共通財產的巨大資源之開發與指揮，不會是為着少數人的利益而會是為着全體的利益」；法國會使她所有的國民都在安全中養育子女。」

但是自從法國解放以來，戴高樂政府僅僅把法國北部若干煤礦及巴黎附近的「雲老迪」汽車工廠收歸國有。因為後者是一個親德分子的財產，所以嚴格說來只能算是沒收賣國賊的產業而不是普通所積的

「國有」。除此以外，戴高樂並沒有宣布還有甚麼工業或財產應當收歸國有。

戴高樂在這一方面行動這樣遲緩有兩個原因：

第一，在法律上，法國的臨時政府是一種革命政權，並不是經由人民投票產生的。戴高樂覺得大規模的社會經濟改革必須得有人民的明白授權，那就是說，必須在選舉以後，纔能實現。

第二，在思想方面，戴高樂本人本來是一個保守分子。他的目光和精力所集中的是在國際上爭取法國的光榮，至少是恢復戰前一等國的地位。他不願意國內有激烈的社會經濟改革，引起重大紛爭。但是戴高樂的這種法律見解和保守思想是不為抵抗運動的分子所贊同的。他們覺得戴高樂應當做效當日芮舍留對付封建貴族的辦法，把銀行和關鍵工業即刻收歸國有。他們反對拖延，因為法國的反動資本家爲了會和德國合作的原故，現在內疚神明，外慚清議，憂譏畏議，銷聲匿跡，在此時舉辦重大改革，阻力甚少，易於有效實現。如果日子久了，他們又會抬頭，又會增加改革的困難。

因爲如此，在法國解放一年多當中，戴高樂和抵抗運動的分子業已發生兩次重要衝突。第一次是去秋戴高樂下令解除自抵抗運動長成的「法國內衛軍」——尤其是共產黨領導的「愛國民團」之武裝。因爲反響很大，戴高樂不得已，暫緩執行。他認爲等到正式陸軍有充分的設備與軍裝以吸收以前的非正式軍隊之一大部份，以及工業生活重新建立，足夠給予其餘的兵士以工作時，這個問題自然較易解決。

第二個重要衝突是起因由於恢復憲法問題。上面說過，戴高樂以法國現政府非經人民投票產生爲由，反對施行重大改革。所以恢復或成立新憲法及依憲法辦理國會選舉，是一個當務之急。關於這個問題，法國左派分子認爲第三共和失敗的主因，是大工業，銀行業，以及一般上等階級支配了法國的政治，而上議院則尤其是他們的大本營。所以他們主張不要恢復一八七五年的舊憲法，而另行召集制憲會議，制定國會只有一院的新憲法；而新立法機關須有控制政府的完全

權力，以便利實行經濟改革。戴高樂的主張恰恰相反。他主張在本年十月間舉行人民投票，決定是否選舉一個暫時的國會以修改憲法，修憲的時間定爲七個月。在此期間，那個國會對於政府只有有限的權力，期滿必將新憲法交與人民投票決定取捨。如人民不贊成此辦法，則舊憲法自動恢復。照他這個計劃，或者在好幾個月的時間以內，他可以一身兼掌立法行政大權，爲所欲爲，不守控制；或者恢復舊憲法的兩院制，利用上院的守舊以對抗下院的激進。

但是他這個如意算盤，雖經他的內閣通過，卻被法國的「諮議會」——暫時的立法機關——否決了。諮議會的議決，是由人民選舉一個有卓越立法權的國會以制定新憲法，並且規定法國殖民地合法選出的代表應有權參加。

這是法國最近的一場重大鬭爭。在這場鬭爭中，戴高樂會以辭職相要挾，但是諮議會沒有理會他。他於是又別出心裁，擬定減少工業區域的代表人數。譬如說，巴黎所在的塞拉區，在一九三六年選舉時，本來可以產生六十名代表。他現在擬定減爲四十七名。這樣，又引起了左派政黨及勞工團體的激烈反對。據後來的消息，戴高樂擬讓步，把那一區的代表名額增到五十三，其他工業區域也酌量增加。

據紐約時報駐巴黎記者克德氏的報告，戴高樂希望借重天主教政黨及社會黨以對抗共產黨。但是近數月來共產黨正在力謀與社會黨接近，新組「人民陣線」，聯合競選，以取得十月間國會選舉的大勝利。雖則最近社會黨全國大會中拒絕與共產黨作「機體的統一」，而且其所提統一的三個條件——（一）坦白宣佈政策，不戴機會主義面具；（二）尊重真正民主與個人自由，堅持大小國家權利平等；（三）專爲勞工利益奮鬥，不與任何外國政府發生聯繫，並保持批評與判斷之充分自由——大概也不會爲共產黨所採納，但是在選舉時以及對於特殊問題雙方合作仍是可能的。

除了上述幾個衝突中充分表現左派勢力之不可侮以外，如不久前以前，法國全國各市議會選舉，共產黨與社會黨之佔有一半以上的議

席，貝當的受審與被判死刑（紐約時報的克能德氏曾稱爲係整個法國資產階級的受審），都在表示法國民衆之左傾。

四 比國

比國在戰後的政潮，主要也基於左右兩派的衝突。第一個衝突，是比國的流亡政府回到比國以後，因爲拒絕把共產黨人加入內閣以及履行改良機構的諾言，引起煤礦工人及運輸工人的一串罷工。接着，因爲前首相庇爾勞德借重英國武力解散抵抗運動的軍隊，尤其引起很大的衝突。但是本年二月十一日比國內閣改組，以抵抗運動分子八名充任聯合內閣閣員，以著名的抵抗運動領袖兼社會黨首領王埃克充任首相，並且停止執行強迫解除抵抗運動武力的命令。抵抗運動方面，也相信無須再保持武力，作爲強迫政府接納其要求的工具，那些半獨立的組織方纔逐漸消失其個性。

但是不久以前，比國的左右勢力又發生一場巨大的衝突，其導火線爲比王回國問題。比王黎阿頗德三世在一九四零年下令比軍對德降，拒絕把政府遷往英國；在德國控制的幾年中，又和納粹發生了一些來往，本來已經引起人民的不滿。但人民最不滿的還並不是他個人，而是他所代表的比國守舊勢力。當去年比國獲解放的時候，比王已被納粹擄去，由其胞弟攝政，所以暫時沒有問題。本年五月德國投降，比王也恢復自由，比國的左派勢力堅決反對他回國，派了許多人勸他自動禪位。他最初也有些動搖，但是後來因爲受着比國守舊勢力的慫恿，他的態度忽然強硬起來。這時，比國的勞工羣衆至爲憤慨，決定他如果堅持回國，則以全國總罷工對抗。首相乃根據比國憲法第八十二條國王如果不能行使職權時建立攝政以代行其職權的規定，向國會上下兩院提案，規定比王在回國以先，須得國會通過，認爲其「不能行使職權」業已終止。這個法案於七月十七日在下院以九十八票對六票通過（有保王派議員三十二人缺席），翌日在上院以七十七票對五十八票通過。一場軒然大波，始告平息。

這幾場大風潮鬧過以後，比國政治已爲抵抗運動分子所支配。照現狀觀察，如果比國辦理選舉，國會中左派的勢力恐怕會更有增加；因爲現國會係戰前選出，當時人民還沒有遭受納粹統治的痛苦，也沒有對比王存甚麼惡感——總之，還沒有左傾到今日的程度。

五 意大利

在意大利與在比利時一樣，左派與右派衝突的核心是王位問題。我們知道意王武曼洛耳二世比較比王還要反動，墨索利尼的上台完全是他同意的。因爲如此，意大利民衆的反對王室，比較比國民衆尤爲激烈。他們不僅反對意王，根本主張取消君主制度，成立共和國政府。意王被迫禪位以後，他們還是繼續原來的主張。但是英國則去年底拒絕民主領袖斯阜滋伯爵充任外交部長，本年春間又拒絕社會黨首領龍里組閣。英國所希望的是意大利政權永遠操在巴多格利阿一類的右派人物手中。然而自從四月間意國的民族解放軍克服意大利北部，並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處決墨索利尼等以後，意國勞工羣衆的勢力，突然成爲意國政治上的一個最重要因素。甚至紐約時報也說「意大利的勞工革命，就其爲羣衆示威而言，規模之大，歐洲他處無有其比。」結果，主張與王室妥協的波羅米內閣不得不辭職，而由解放軍的副總司令柏里繼任首相，並以社會黨及共產黨首領分任副首相。

如果意大利民衆運動不受外力束縛，政治上第一樁事情大概是召集人民代表會議，決定是否繼續維持君主制度，抑或成立共和國體。照現狀觀察，後者大概很有可能。因爲在意大利的七個政黨中，社會黨，行動黨，共產黨，和共和黨都公開反對君主制度；基督教民主黨分成兩派，只有勞動民主黨及自由黨贊成與王室妥協。

因爲意大利的政制還沒有確定，新政府也成立不久，所以只有在勞工勢力最大的意國北部，許多設施改革，顯然表現左傾，在意中與意南還沒有很大的變動。但是左派勢力在政府中既已抬頭，目前社會黨與共產黨又在進行合作，以期於選舉時，獲得巨大勝利。如果他們

勝利，則社會黨首領龍里所言「制憲會議會給予意大利以一個真正的共和政府與一個基於把大部份社會化的新社會與經濟組織」，真會有實現的可能。

六 挪威丹麥與荷蘭

挪威是第二次大戰中大受納粹蹂躪的一個國家，所以挪威的抵抗運動，在北歐各國中也特別激烈。現時挪威內閣中只有兩位閣員是以前挪威流亡政府的舊人，首相以及大部份閣員均為工黨（社會民主黨）黨員，共產黨黨員也第一次在挪威歷史上佔有兩個閣席。

因為在抵抗運動中，工共兩黨有共患難的袍澤之誼，所以挪威光復後，他們對挪威的政治，也採取合作的態度。他們曾經聯合發表宣言，要求成立真正的人民政府，依和平途徑實現社會主義制度。在宣言中，他們列舉一串的基本人權，其中包括工作權在內。他們又要求與一切愛好和平之國家合作，特別是與蘇聯合作。

本年五月間挪威工團聯合會建議上述兩黨合併為一個勞工政黨以參加十月八日的全國大選，經兩黨同意。隨即組織一個臨時委員會，由兩黨各推代表三人，工團聯合會推代表二人，磋商合併及競選事宜。

丹麥在一九四零年時，毫無抵抗，被德軍佔領。但是丹麥民衆不久就嘗得納粹統治的滋味，所以也發起一個秘密的抵抗運動。這個運動，在過去一年間，頗為活動，其分子現時成為丹麥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最近丹麥共產黨與社會黨磋商合併，據八月十一日的路透社電訊，已有高度的進展。

荷蘭政府逃往倫敦的時候，跟去的兩千荷蘭人中，一大半是荷蘭大工商業的董事，經理，與其他高級職員。荷蘭克服之初，政府各部重要職務，還是那些人充當。但是本年六月二十三日荷蘭內閣改組，以抵抗運動的領袖之一斯澈汰航教授充任首相。新內閣十四閣員之中，只有三人是舊政府人物。其餘十一位都是抵抗運動的著名領袖。

七 波蘭

以上把西歐會直接受戰禍的國家在戰後之政治傾向敘述了一個輪廓。但是今日談起歐洲的左傾，最引人注意的還是東歐國家。那不僅因為在大規模社會及改革方面，西歐國家一般還在「坐而談」的時期，而東歐則已在雷厲風行地實幹，而且是因為東歐鄰近蘇聯，有許多國家至今仍為紅軍佔領，因此直接受着蘇聯的支配或影響。現在先述波蘭的概況。

波蘭是一個大地主與窮苦農工——特別是農民——構成的國家。波蘭的中等階級，在俄國革命，奧國崩潰及第一次大戰的通貨膨脹中淪落。當時的地主階級也喪失了許多資產。他們蜂擁而加入陸軍，充當軍官，在畢爾索斯基領導之下，攫得了政權。後來他們又修改波蘭憲法，規定總統可以自己選定繼任人，這樣，鞏固了他們的獨裁統治權力。在戰前兩三年中，波蘭的社會黨與農民黨逐漸抬頭，在地方選舉中獲得了許多勝利，但是國家大權，還是操在總統及陸軍總司令的掌中。一九三九年波蘭戰敗，政府遷往倫敦，為時勢所迫，組織了一個聯合內閣，以西考斯基將軍為內閣總理。將軍是主張對蘇妥協的，但是他的屬下軍官以及羣集倫敦的富有階級繼續堅持反蘇政策，所以幾次的對蘇談判都不能成功。

同時，波蘭的左傾分子則在莫斯科成立「波蘭愛國者聯合會」。這個團體到了一九四四年之初，改為「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後來蘇軍攻入波蘭，隨着遷到魯布林。本年一月十八日又遷到波京瓦薩，正式改稱「臨時政府」。這個政府成立之初，包括有波蘭社會黨及農民黨黨員五人，工黨黨員四人，民主黨黨員二人，及無黨派者一人。但是入閣的各民主黨派人員都不是戰前的最著名領袖，而總統畢耳羅特則是以前共產黨秘密組織的一個首領，曾於一九三九年襄助蘇聯管治波蘭東部，所以英美認為完全是一個聽憑蘇聯支配的政權，不肯承認。

本年三月雅爾太會議時，三強曾經議決「波蘭現時臨時政府應基於一較廣之民主基礎重行改組，加入波蘭國內及國外之民主領袖。」後來蘇聯因為發現這些領袖中有些有反蘇的行爲或嫌疑，拘捕了十六人，引起英美的大嘩。反覆磋商幾個月之久，直到那個案子審判完結，三強方纔商定波蘭新政府的人選。計加入了倫敦流亡政府的前任內閣總理米考拉齊克爲副總理，斯丹齊克爲部長，格拉斯基及波蘭內部的農民黨首領威託斯爲總統院的三位院員之二。這個新政府於六月二十八日成立，於七月五日得到英美兩國承認。

波蘭的社會改革，在過去一年中有了長足的進展。民族解放委員會在波蘭境內行使職權之初，即開始把大過一百二十四畝的地產沒收，分配與耕地不及十二畝半的農民，以維持其一家之最低限度之需要。此外，波蘭政府應允在搬遷東普魯士及奧德河以西區域的德國人以後，給與土地與貧農。據一九三一年統計，小農擁有地產不及十二畝半者共達一百九十萬戶之多，新土地法令施行之結果，估計受惠的農民會有三分之二。

波蘭現政府雖然增加了好幾位民主政黨領袖，但政權的左傾性質並沒有根本改變，因此，業在實行中的社會經濟改革不會因而停頓，何況這些改革，有許多本來一向也是倫敦流亡政府一派人的「口惠」呢？

八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的左右兩派鬭爭，開始於一九四一年德軍佔領該國以後。當時南斯拉夫的統治階級重要分子逃往倫敦，跟隨彼得幼王，留下舊日南國正規軍的一個將軍米海洛維芝在南國收容戰敗的軍隊，其目的是在等候聯軍大舉進攻時，出而響應。左派民衆則在共產黨人狄多將軍領導之下即刻發動游擊戰爭。這左右兩派的武裝時常發生衝突。

突。米海洛維芝一派鑒於左派勢力的日益擴張，免不了和敵人有些勾搭，至少有按兵縱敵的嫌疑。結果，英美乃一變原來贊助米海洛維芝的政策，以全部軍需品物援助狄多。這樣，狄多將軍就成爲南國的正式實力派。

左派既擁有廣大的民衆，又有軍事實力，在政治上右派當然只有讓步。所以南國流亡政府的內閣總理梭巴昔智於本年初和狄多將軍成立一個協定，實行一個代表南國三大民族的三人攝政制度。在攝政制下，一面正式罷免米海洛維芝，一面把流亡政府的若干人物加入游擊隊所組織的政權，即作爲南國的正式政府。

彼得幼王最初反對上述合併辦法。但是梭巴昔智堅持實行那個協定，他也沒有法子制止。本年三月九日，南國新政府成立，以狄多將軍爲內閣總理，梭巴昔智爲外交部長，另外加入了一些穩健派人物。至於英美在雅爾太會議中所主張的把未曾與敵合作的舊國會議員一百名加入新國會，則因爲「合作」二字解釋的困難，以及舊國會議員選舉法係以保證政府派候選人當選爲目的，缺乏民主精神，至今並未能實現。

九 羅馬尼亞

在這場戰爭中，羅馬尼亞原是軸心的附庸之一。雖則在去年夏間，羅馬尼亞的德軍業被紅軍趕走，親德的首相也被國王下令拘捕；但是在紅軍的秋季攻勢中，羅馬尼亞仍是紅軍的一個主要軍事根據地。本年二月，羅馬尼亞的社會黨與共產黨指摘拉德斯果將軍內閣肅清法西斯餘孽不力，要求改組。蘇聯也以該政府不穩定，影響軍事進行爲由，出面干涉。結果，乃由左派分子合組的「民族民主陣線」的領袖之一葛羅扎氏出組新內閣。新內閣是聯合性質，其中有戰前的一位首相充任副首相及內政部長，有共產黨人充任司法及宣傳部長。

新內閣成立的第一樁工作便是請求蘇聯把匈牙利在一九四零年特德軍勢力佔得的頃西文尼亞北部交還羅馬尼亞，這個請求，即得到蘇聯的應允。這樣新政府的聲望陡然增高，地位因而穩固不少。

新政府對於上述地方的治理，採取培植民主勢力，不分種族界限的政策。那裏的匈牙利種農民與羅馬尼亞農民同樣分得土地，匈牙利人也可以充當公務員，政府又創辦匈牙利語文學校，並且准許匈牙利人成立民主團體。

新政府的第二個重大工作便是土地改革。因為羅馬尼亞在第一次大戰後曾舉行土地改革，所以這次改革，就在社會變動而言，不及隣邦匈牙利之厲害。新政府於三月二十二日發佈土地改革法令，其重要內容，第一爲沒收：（一）曾與納粹合作的德國人或德種人，（二）戰事罪犯，（三）對國家大禍的負責者，（四）向敵國逃匿，或自去年八月二十三日起逃往國外之不在地主，（五）擁有一百二十五英畝以上者之土地，重行分配，作爲農民的私產。第二是政府知道農業經濟繁榮，不能單純靠分配土地，所以規定凡從上述被沒收之土地得來的一切農具、機器及其他農業機器，完全歸於國家，由國家設立農業區域中心，把機器租與農民使用，並指導其改良農業技術。因此羅馬尼亞的土地改革，一面是維持私有財產制度，一面採取蘇聯集體農場的若干辦法。

羅馬尼亞土地的分配，係由貧農及全無土地之農民組織特種委員會辦理。新地主獲得土地也須少許償付代價，視其經濟情形，分十年至二十年的期間歸還。

第三個重大工作是懲治戰事罪犯及法西斯分子。這一項引起的糾紛最多。因爲有些人，例如農民黨首領曼理阿之類，在新政府視爲係法西斯分子，但英美則一般視其爲民主政黨領袖。本來英美對本年二月間羅馬尼亞的政變，批評蘇聯獨斷獨行，未與他國磋商，蘇聯則反唇相譏，說英美不應干涉羅馬國內政。九月間，羅馬內閣總理葛羅扎氏從莫斯科會商回來後，宣佈羅馬國將舉行「最自由的選舉以證明民心的傾向」，同時宣稱反對派的運動未足以動搖政府。

一〇 匈牙利與保加利亞

這兩個國家在戰前一向受着反動政權的統治，希特拉勢力突興，它們更輸入了納粹主義。蘇軍勝利以後，這兩個國家的社會變動也最爲厲害。但是在目前二者對政治及經濟改革之着重點卻又有些不同。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匈牙利成立了一個聯合政府，以一個著名的舊日陸軍軍官米克洛克斯爲內閣總理，內閣閣員包括軍人，名流，及以前的民主政黨領袖。在政治色彩上這個政府是保守的，因此，也比較得到英美的認可。

但是這個政府的經濟改革，在歐洲卻又最爲重大。匈牙利的土地集中，爲任何歐洲國家所未有。據估計，三千地產共擁有土地九百萬英畝，約及全國土地三分之一。聯合政府的土地法令規定凡是超過一千畝的地產一律無償沒收，教會地產也限定不得超過一百英畝。這些土地將分配與三百萬農業工人。這個改革，將予匈牙利的貴族與大地主以極大打擊。

保加利亞的臨時政府是去年九月八日由政變而產生的。政變的主持者是一個親俄的祕密組織，名爲「祖國陣線」，其中有共產黨人，社會黨人，軍官及農民領袖。但是一向主張議會制度及民權的農民黨不在其內。新政府仍然維持攝政制度，但是攝政的二人之一是一位著名的共產黨首領。新政府甫經成立，即刻組織「人民法庭」，大行拘殺親法西斯的分子，而且就是農民黨的領袖，也被政府防範干涉，不遺餘力。譬如農民黨首領第米屈夫逃往美國寓所，新政府甚至派兵駐在寓所前面，實行監視，直至美國和蘇聯交涉，方始撤退。最近消息，新政府下有些過激分子，行動越軌，甚至被蘇聯駐軍槍斃示儆。保加利亞的自衛戰很多，土地並不怎樣集中，所以關於經濟改革，「祖國陣線」的政綱中只籠統說「注重勞動者利益」；提高一般人民生活水準，並不怎樣驚人。但是在政治方面的左傾，則遠較匈牙利爲厲害。甚至就是美國自由主義派的刊物，如「民族週刊」

「新共和國週刊」也批評保加利亞現政府在排斥異己方面手段過份。新政府本來擬定在八月二十六日舉辦全國選舉，但是選票上只有政府黨的候選人姓名，引起英美的嚴厲批評，認為違反民主精神，「祖國陣線」中的若干社會黨與農民領袖，也嚴重抗議，新政府不得已乃宣佈選舉延期。如果英美也實行干涉希臘的白色恐怖運動，則保加利亞的紅色運動，也許有少許沖淡的可能。

一一 奧國與德國

本年四月二十九日，蘇聯宣佈奧京維也納成立新政府，以第一次大戰後奧大利共和國首任內閣總理社會民主黨領袖雪萊博士為內閣總理。閣員有六名社會民主黨人，三名共產黨人，及四名基督教社會黨人。就新政府的組織成分看來，本不是一個極端左傾的政權。但是英美因為新政府的成立，由蘇聯一手主持，沒有和英美商量，認為有違雅爾達協定，拒絕承認。不過承認奧國獨立，以前曾經見於三強的鄭重宣言，佔領期間勢不能不較德國為短，而且新政府在本質上本來是各方都可以接納的，所以八月初的波茨坦會議中答應「在英美軍隊進入維爾納以後，由三強商定增加臨時政府之權力。」

德國的情形與奧國不同。因為聯軍佔領德國的時間必然較長（有人主張十五年，有人主張六十年）。所以德國的中央政府現時很少有產生的可能性。不過紅軍所到的地方，一切反法西斯的政黨都能公開活動，其中以共產黨與社會黨的工作最為緊張，這會是將來德國新政府中的最重要勢力。八月十一日法國社會黨開會時，德國社會民主黨致電道賀，並且聲稱將努力「重建國際社會主義」，足見他們的抱負不凡。

英、美、法在德國的佔領軍防區以內，最初完全禁止政黨及工會活動。但是卜斯丹會議中決定在不妨害軍事的場合，准許他們有活動自由。

奧國及德國之經濟改革，暫時還只有沒收納粹分子及戰事罪犯等

之產業，取締大規模托辣斯等數項。但本月九日紐約時報載奧國臨時政府的商務部長擬議國有動力、礦產、石油、鋼鐵、及國營重電汽設備，火車頭及車箱之製造。

一二 捷克與芬蘭

上述東歐戰後成立的一些政府一般都被視為蘇聯的製造品。但那裏至少也有兩個例外，那就是捷克與芬蘭。

捷克政府一向是一個民主的比較進步的政府。在以前，它一面聯英法，一面聯蘇聯；但是因為在慕尼黑會議時，捷克被英法出賣，而當時對捷克真摯同情，甚至願以實力協助的，只有蘇聯一國，本年捷克之解放，又得有蘇聯很大的助力，因此，捷克朝野上下無形中特別傾向蘇聯。關於軍事、經濟，及文化事業等，自動願與蘇聯合作。本年四月七日捷克新政府成立，以左派社會黨員前駐蘇大使菲耳格為內閣總理。閣員中有七人是共產黨員，佔有內政部長，教育部長，宣傳部長，及副閣揆等重要官職。

就經濟政策說，捷克因為一向是比較進步的民主國家，社會矛盾不及東歐其他鄰國的尖銳。但是在本年四月三日貝納斯總統還回捷克以先，捷克政府業經宣佈如得國會通過，全國的關鍵工業有國有經營之可能。事實上，這些工業在戰時幾全被德國人沒收，所以今後交由集體經營，也比較方便。據九日紐約時報消息，捷克業已國有了五一三商業機關，二四七五工業組織。貝納斯總統對該報記者說：「每一個現代戰爭同時也是革命之一部份。當革命走向極端時，引起了反革命。捷克的革命業已停止在一點，其性質是永久的，不會有反動。捷克永遠會是一個若干基本工業國有經營，而同時具有合作事業及自由企業的国家。農業及動產會永遠是完全自由的。」

芬蘭是這次的一個戰敗國家，但是因為其民性強毅，社會內部也較少衝突，所以戰後還能維持其基本社會與政治機構，少受外力干涉。不過在整個歐洲的左傾狂潮中，芬蘭也不能居於例外。本年三月

十七十八兩日芬蘭舉辦國會選舉，在兩百議席之中，左派政黨得到了一百零三席，其中明白親俄的「民主同盟」——係以共產黨為核心組織——得到了四十九席。右派政黨只得了九十七席。左派的社會民主黨中本來分成親蘇反蘇兩支派，目前似乎是親蘇派得勢。假使他們與共產黨合作，那就可以在國會中佔多數。新內閣是一個廣泛的聯合內閣，十八個閣員中有十一個是左派人。

芬蘭目前內政上的核心問題，與其說是經濟改革，不如說是懲治戰禍負責人問題。在對蘇戰爭中，不僅右派大賣氣力，就是社會黨中也有許多是支持政府的。如果一一追究負責人，當然牽連很廣。但是內閣總理派西起維氏在八月底曾經警告國人，謂與其讓蘇聯來要求懲治，不如自動懲治，所以這一舉大概最後還是免不了的。

一三 亞爾巴尼亞與希臘

亞爾巴尼亞在這場戰爭中很早就被墨索利尼佔領了，但是亞國雖小，民性卻很強悍。在過去幾年中，他們組織了抵抗運動，不斷與佔領的意軍鬭爭，以至於完全恢復獨立，現時的亞爾巴尼亞完全在左派掌中，其經濟政策，一面側重於沒收意大利在農業礦業方面的一切投資，一面側重土地改革。在以前，亞國的土地有百分之八十屬於地主，地主每年向佃農取得三分之二之收穫。現政府正在把土地分與農民，同時減低租稅。此外，又在設法發展工業，尤其是煤油採煉工業。

戰後歐洲政治上的一個最普遍傾向，是戰爭期間從事抵抗運動的分子之抬頭，這裏唯一的例外是希臘。

戰前的希臘是一個獨裁國家，一九四一年希臘被德軍佔領以後，希王出亡海外，希臘左派民衆則組織「民族解放陣線」，發動一個極堅強的抵抗運動，與德軍作幾年的殊死鬭爭。這個運動的主要目標，對外是抵抗德國，對內是建立一個民主政府。當去年十月德軍撤退時，他們幾已佔有全國三分之二的土地。

希王出亡海外時，也帶領了一些殘餘海陸軍，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不穩固，所以當回到雅典檢閱軍隊時，須請求英國軍隊先將希軍繳械以防不測。這樣，引起了本年初六個星期的猛烈內戰。「民族解放陣線」的軍隊因為敵不住英國大軍的坦克與飛機，在二月十二日停戰議和。其條件是停止戒嚴，釋放人質，赦免抵抗運動分子，肅清親德分子，保證民主自由，成立國家軍隊，舉辦選舉及人民總投票以決定王室的前途。

希臘現時是以大主教攝政，以保王派的海軍部長為首相。到了最近，保王派認為右派勢力業已根深蒂固，主張從速辦理人民投票以決定王位問題，英美兩國也已經答應派員參觀選舉，但是蘇聯認為在右派這樣的恐怖政治之下，希臘沒有選舉的自由可言，謝絕參加。同時希臘的中和派政治領袖若干人也發表宣言，說大部份選民不敢投票，註冊人數在許多地方僅及百分之五，主張把選舉延期。

八月十一日英國工黨執委會主席拉斯基教授對法國新聞界發表談話，說英國政府業已完全改變其對希臘的政策，在希臘希臘「選舉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即令因此而招致「民族解放陣線」抬頭，也在所不顧。」假如英國工黨政府真的這樣做，希臘的政治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所以，左派最近在希臘又開始活動，街道的許多牆壁上都寫着阿特里和拉斯基的名字。不過事實上工黨政府對英國的外交政策改變得很慢。最近希臘的大主教到倫敦去，大概主要是談商希臘的內政問題。

關於經濟政策，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的主張是規定工資及工作時間，組織農民合作社，國有鐵路，銀行，公用事業，舉辦大規模公共建築，包括公路，學校，及醫院在內。

一四 西班牙與葡萄牙

這兩個國家都在獨裁政權的統治下，人民的意志是很難表現於行動的。但是過去幾年中，西班牙的共和黨人仍在山嶺區域不斷作小規模的。

模游擊戰爭，法國光復以後，他們更形活動。最近共和黨人在墨西哥正式成立政府，而英美對西班牙的政策也在改變中，所以西班牙政局的轉變，只是時日問題。在目前英國大概希望西班牙復辟，蘇聯大概比較同情於西班牙最後的勒格永左派內閣，美國大概有可能傾向於贊助新近在墨西哥成立的政府。這三者的傾向之間顯然有許多分寸，但佛蘭哥下野，則逐漸成為他們的一致主張。如果佛蘭哥獨裁政權崩潰了，與西班牙陸地毗連的葡萄牙之獨裁政權，恐怕多少也會受着一些影響。

一五 瑞典與瑞士

這兩個國家，在這場戰爭中，也是守中立的，而且因為平日所行的本來是民主政治，所以在戰後大概不會有甚麼很激烈的政治變動。不過最近瑞典政府也在開始清查德國在瑞典的經濟勢力以及對德同情的分子。瑞士政府會屢受蘇聯指摘，如果想要加入聯合國，大概在政治方面，也許須有若干的人事變動。

一六 結論

如上所述，戰後歐洲的政治情勢，概括起來，有如下幾個特徵：

第一，整個歐洲，自東至西，自南至北，不論是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抑或條頓民族，都在左傾。左傾的程度和步驟容有不同，其為左傾則一。

第二，在東歐國家，左傾的具體表現，最顯著的為土地改革。從社會進化史講，這不能算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而只能算是對殘餘封建制度的革命。這個革命的目標，在使農民分得土地，主要上仍然維持私有財產制度。

第三，東歐國家，雖然不能跳過歷史的必經過程，即刻走上社會主義之路；但是因為其隣近社會主義的蘇聯，而且領導這場反封建革命的中心分子，大都是社會主義的景仰者，所以在他們所主持的政權下，雖然不會用「拔苗助長」的方法提早實現社會主義，但是一面

不會容許私人資本主義怎樣抬頭，同時會儘其可能擴張國營事業的範圍，至少對於經濟活動，增加公共的干涉與統制。

第四，西歐國家，因為資本主義比較發達，工業勞動的人數比較衆多，組織也比較堅固，所以政治運動的目標側重實現社會主義，至少是實現社會主義的一部份。不過西歐左傾的目標雖然較之東歐為更進一步，但是就階段說，則其實現的成績還遠不及東歐。這裏的基本原因是：西歐的左派運動雖然逐漸得勢，有的還沒有完全得到政權，有的雖則大權在手，但是為時甚暫，或者環境困難，還不能有很多的表現。

第五，戰後歐洲各國的左傾運動，一般以戰爭期間抵抗敵人最力的分子為中心。這個現象之構成，主要由於右派及上層階級之未曾努力參加抗戰，甚或與敵人勾搭。其結果是：抗戰的左派分子用鐵血換來的江山自然不願拱手讓給順敵親敵或逍遙海外的右派。流亡政府之一般失勢，就可以拿這一點來解釋。當然，在蘇聯勢力所及的東歐國家中，左傾運動，也許有為蘇聯發難指使或武力促成的嫌疑，而且行動有些也許未免越軌，但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社會矛盾平日實在太尖銳，封建勢力壓迫人民的手段太殘酷，所以舊秩序一為戰事動搖，廣大羣衆一經解脫桎梏，其心理易趨變態，報復易走極端。甚至有些不依附或同情軸心的民主分子，也在這一場狂風掃落葉式的大運動中連帶被波及。但是這個運動並不一定要依賴蘇聯的武力而後發生，同時，除非右派假借外國的武力保護，實行恐怖政策，恐怕沒有方法可以鎮壓它。

第六，東歐的左傾運動，手段比較激烈，有些甚或未免越軌。西歐的左傾運動，則大都曾經由民主的，合法的程序。當然，如果西歐的舊日統治階級，不知道順應潮流，一意孤行，根本拒絕改革，則那個運動也不見得沒有演成「挺而走險」的可能。這裏，美國的舉動很關重要。因為美國不僅有力量可以予那些國家以巨大的物質贊助，而且可以把羅斯福總統「釜底抽薪」的新政綱義介紹給它們。

蘇聯的財政制度

徐日琨

我們立國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經濟制度國家之間，實行民生主義經濟制度，此項經濟制度有它固有的特質和範圍，與英美資本主義的制度不同，而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制度有別，因此我們應當擇兩者各方面之所長，以補我們之所短。就財政制度而論，過去國人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等，曾有不少人加以研究和著述，但是於共產主義國家的蘇聯的財政制度，卻很少作有系統的介紹，原因或以過去材料缺乏，或因報道不正確。最近以資料較完備，我們特別加以敘述，或有可供我國採擇之處。

一 蘇聯財政制度的結構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蘇聯財政制度根本的基礎，蘇聯經濟的結構在她的憲法中規定非常明顯，從經濟上觀察，蘇聯有兩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公有財產——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兩大柱幹——：(一)國家財產——包括土地、礦藏、水利、森林、工廠、製造廠、交通、銀行、郵政、國營大規模農業，及城市與工業地點之市政企業及主要住宅等；(二)合作社與集體農場財產——凡集體農場與合作社之公共企業，及其工具與耕畜，出產之生產品，以及公共建築物，均為集體農場與合作社之公共財產（憲法第五條）；此外，(三)在農業方面尚有少數私人自力經營，而毫不剝削他人勞動之個人農民；以及(四)城鄉無數為求滿足自己消費的勞動者，上述四種經濟單位的所得均取之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其收入的來源全由工資基金所組成（一九三七年達七百八十億盧布），和附屬於集體農場的私人經濟出產品而來，因為集體農場之每一農戶，除從公共集體農場領得主要收入，即每一農

戶為公家耕種應得按照其勞動價值獲得之報酬外，每戶可以有小塊園地（約十五畝），供給其個人使用，在這塊土地上所有副業以及住宅生產品牲口家禽及小農具等，均為個人的財產。蘇聯財政制度的組織即與上述經濟結構吻合的。

關於國家財政及基金而生的經濟組織，就是國營企業。其財政制度是一意確立一種基金的蓄積（即成本與售價差額之盈利，及資本償還金），把這些蓄積基金投入，重行分配於經濟組織間的各部門，以及各項需要。同時，財政制度藉國家銀行為溝渠，安排國有企業，并互相調劑他們各部門的營業。至國營企業的臨時需要經濟的來源，貯積於國家銀行，其分支行有三千，分佈全國，係專門做短期放款的機構。

關於國營企業蓄積基金，由兩種方式進行：一部分得自徵稅方法，即在產地出售產品時徵收營業稅（或稱躉售營業稅），這種課稅是從盈利中提出一部分。另一部分基金的蓄積，除了以營業稅方式提取作累積外，則照總清賬上留有盈餘何預算中提取。

至另一形式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即集體農場與合作社——其財政制度限於集體農場及合作社事業徵收所得稅。而營業稅，祇有手工業合作社出賣產品時始行徵收，其目的在維持國營企業與合作社企業產品價格的一致，照例工業合作社所付的營業稅率皆列入小工業之林，通常較國營企業所納的稅輕得多。

個人自力經營的經濟單位繳納與所得稅相似的兩種稅，不過稅率較合作農場所納的為高，我們上面說過，農場所得稅是根據其總收入計算的。

稅。末了，勞動者爲着自己消費而生產的經濟經營，繳納遞進所得

蘇聯財政的結構，不僅大受社會經濟機構的影響，並且受聯邦政治組織的影響。蘇維埃聯邦是十六加盟共和國的聯盟 (Federation)，其中有幾個是自治共和國，財政制度的組織完全反映她聯盟的組織。因爲每個共和國有她自己獨立的預算和她的地方預算制度。

每個共和國雖完全享有自主的權利，以適合每個聯邦地制宜的組織，可是蘇聯財政制度卻根據內部統一的原則。這種原則首先表示財政制度與蘇聯社會主義聯邦的經濟計劃底目的相合，且適合憲法，以決定全蘇聯的經濟生活。統一的原則在兩個基本事實上表現最爲明顯：一爲聯邦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每年批准蘇聯國家預算，包括聯邦政府預算及各加盟共和國的。後者是先由各該政府所批准的。其次爲蘇聯最高機構批准一切稅捐，與其他中央及各共和國及地方收入之來源，俾財政政策趨於一致。

無疑，財政政策統一原則，自然引起某種財政關係的集權，結果全聯邦政府預算所佔的數量，遠較各共和國的預算爲優越。一九三七年，在預算支出總額九百八十億盧布中，而全聯邦政府則爲七百五十五億盧布。全聯邦政府預算之所以如此龐大，有它的理由存在，一則由於這個預算，它引導大量重要的支出，以培養國營經濟事業（三百八十四億盧布）。二則由於這個預算，使有關國防支出趨於均衡。假如我們研究支出的分配，全聯邦的預算可以稱爲經濟建設的預算；至於聯邦共和國預算和地方預算，我們可以說是社會及文化事業的預算。一九三七年，這種文化等支出在各共和國預算中佔百分之六十七，地方預算中佔百分之七十一。結果財政方面集權與分權互相拉掣。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無論是全聯邦政府或加盟共和國政府，均不能各自隨意設置稅收機關，此種機關概由中央權力所規定的地方機構管理，換句話說，就是勞動者的代表的地方蘇維埃。蘇維埃的財政機構是執行凡是關於它預算有關的收入的工作的。

一一 蘇聯是計劃的財政

蘇聯財政的組織原則是計劃，所以「計劃財政」這個名詞特別適合於蘇聯財政。財政計劃的樹立，可說極嚴格地配合國家經濟計劃，如此才可保證蘇聯財政的穩定。此種穩定狀態事實上表現非常明顯，不僅蘇聯財政上完全免除預算上發生的短絀——因爲計劃經濟制度短少根本不發生，——但還有執行財政計劃亦保證對於短絀的防止。

每個管理財政的機構應將每年的財政計劃編立起來，每個經濟組織樹立它們財政活動的計劃，先由基層細胞把各種計劃，依類別集合起來，送給人民委員會。由它們上級機構審查，改正，及批准，於是才達到預算計劃，才有國家經濟事業的各種財政計劃，然後始達到巨大的財政組織。各計劃的中央機構就是「高司卜蘭」(Gosplan)（即蘇聯國家計劃委員），這些計劃由它編列並與國家經濟總計劃相配合。各種不同的財政計劃由「高司卜蘭」集合起來編成總財政計劃，以觀察各部之計劃在不同的財政制度中是否平衡，總預算的收支帳目是否相符。國家經濟事業的計劃與政府計劃的聯系是蘇聯財政制度穩定及堅強一種最好的保證。

蘇聯財政關係與財政活動是根據兩種實際活動的原則而組織的：一是預算計劃原則，另一是經濟總清帳 (bilane consinque) 原則，後者作每個企業所得的成果及任用的方法以檢別其活動之標準，至於前一項原則的實施，即管理各項行政組織及各種機構向國家預算支取的財務手續，換句話說，就是開支的範圍和母金投資問題。至於經濟總清帳主義，就是使經濟組織的財政工作有一個獨立賬目，事業基金，及流動資本的自給，與國家預算劃開。除非這種情形，或某一個完全國營企業，它的收入與支出總額整個編入預算（如鐵道事業），通常國營企業的營業額是不編在公共預算之中，亦不在總財政計劃之內。許多經濟機構中，一部分的蓄積基金是附屬於國家預算的，但這種蓄積金全數歸入總經濟計劃裏面。財政制度不准將各種組織及財政機構

間和國家經濟各部間的彼此自相剩餘調整。假如某種企業認為要實現一個擴大建設工程的計劃，其費用超過它所蓄積的基金，倘使因為這個理由，增加預算信用成為必要，那末祇不過從企業利益中提取百分之十撥入國庫，反之，假使某項企業在經常工作方面不需要投資，并且超過它規定所蓄積的基金數目，那麼它將撥歸國庫一筆數目達到它的盈利百分之八十。一九三六年各邦國營企業提出之盈利，繳入國庫的總數達一百四十五億盧布（除去先對蓄積數抽稅），其中五十五億盧布由預算中累積起來，一九三七年在盈利數目二百零九億盧布中，九十三億盧布撥歸國庫。

無論如何，各企業保留總盈餘百分之二作為特別經理基金，同時將超過批准計劃規定的盈餘半數加入在內，這筆特別基金留給企業主管人照章處置，他可用以建築工員住宅，文化及福利事業，或作為獎金以分配給一班工廠中的工人，或生產行政管理人員特別有貢獻的人。一九三六年業務報告可以看出這年獎勵費的重要；撥入國庫盈餘數目竟達一百四十五億盧布，超出計劃估計數為十八億盧布。戰事發生以後，此項基金已由其他獎勵成績優異工人的辦法所代替。

三 蘇聯財務的監督

在蘇聯聯邦及各聯邦自主共和國，財政制度的監督是集中於人民財政委員會，至地方預算和地方經濟的監督，則在勞動代表地方蘇維埃的手，國家企業財政的監督，其管理權屬於各種人民委員會，它們指揮國營企業各部分。蘇聯人民財政委員會是一個最高監督機構，它決定整個財政制度的方針。

蘇聯監察財政的目的非常廣大且異常徹底。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不僅使財政紀律不致發生混亂，且能事先預防。財政監督深入生活中。它每每在財政機構運用中執行一切，利用財政職務上的轉移的鍊條(courrois de transmission)，財政監督隨時警告執行計劃時所發生之危險，尋求其原因，立刻加以干涉。它設法去消滅計算方法上錯誤

的原因。一切經濟活動和一切經濟方針都是根據經濟總清賬，至於一般財政機關和金融機關的活動，都完全依據監督原則。監督手續很便利，事實上即每個組織的業務進行都要根據它自己的批准計劃。財政機構因為有監督作用，所以對於計劃的執行，極為謹慎，并負責任。財政監督在蘇聯財政制度上特別注意主要支出：就是關於國家經濟組織的財源問題。這種財源主要有兩方面：一、提自國家預算，和另為各部門國營企業自己經費來源，列於預算上的財源如基金的損失和企業所編列的合法資本。這就是長期信用放款銀行的方法，此種銀行組織底目的就是供各種國家企業通融資金之用。每個銀行投資某項企業是有分別，并由蘇聯人民財政委員會加以審定。銀行都是監督機關。銀行組織是根據二個原則：每個銀行規定投資某項國營企業，而某個工廠祇能向某一個銀行通融資金。銀行設有分支行，由國家銀行的分支行通達各處，舉行短期放款。無論在某種場合之下，國家銀行總是在長期信用銀行中派定會計。

通融資金的銀行把所要投資的基金聚積起來，凡政府由預算上撥給這班銀行以核准辦理大工程的資金，或某些企業的從盈利方面所蓄積的基金，或向銀行存儲的償還金，均可作為投資，銀行根據批准的計劃有權干涉按期付款，及國家經濟組織所交納之款項。

這些特別銀行的干涉擴張到巨大工程方面消費的支付，監督包括消費方式及其基金用途。銀行有權不付未核准而在計劃欄外的工程款項。對於一個工廠沒有估價單或超過預算數，銀行可不放款。這些特別銀行可以對顧客（各企業及機關等）任意停付款項。

四 短期信用與經濟機構的週轉資金

我們敘述蘇聯經濟制度，如果略而不述其短期信用組織，及社會主義化的經濟組織的週轉資金，那就不能認為完全。在蘇聯，短期信用完全集中於國家銀行，其分支行遍設全國，可以說國家銀行是世界最大的銀行。除了短期信用而外，國家銀行負有調節貨幣流通的功

效，和國家各部門間款項匯劃的處置。國家銀行並擁有發行權。

蘇聯短期信用制度的一致性，並不是它不能由一個銀行代表，因為目前蘇聯法律尚未允許。所謂商業信用，即以期票代替，由某企業向某企業支取，祇有銀行信用和各企業間劃賬制度下才准使用，而且強迫由銀行居中施行。一切企業都擁有一個獨立總清賬，在國家銀行制度中有它的賬目格式，供給者與顧主均根據預算而按照這劃賬的方法執行。

短期信用與劃賬制度推行頗為簡單，預先規定有妥善辦法，尤其允許各經濟組織自己所周轉的資金。這種工作實施範圍至廣，以完全確保生產與交易間之常態實施。根據生產程序的擴張和商品流通計劃，每年在財政計劃上註明一筆確實的數目，以增加自己周轉的資本。這筆款項的數目首先從各經濟組織內自己所蓄積經費支取，假如數目不足，再向預算中所規定的信用項內提取。一九三七年各經濟組織的周轉資本增加至一百五十億盧布，在財政計劃中，這項註明是「國家經濟通融費」。

一班企業都擁有自己的週轉資本，使它們能夠照常進行。借款的准許祇有在某種情形之下，即某項企業確實證明需要，因為季節性的關係，可增加週轉金。這種季節性的增加，主要是大批的農業原料品如棉花、小麥、羊毛、糖蘿蔔等的購入，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貨品由生產者轉移到消費者，銀行依貨品數量放款，並以貨品的收條拿來運銷。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蘇聯的銀行信用是堅固底建立於贖回的原則和短期信用之上。

週轉資金季節的增加可以完全計劃化，所以銀行季節放款，可以稱為計劃信用。但是假使一種意外事件在企業中發現，阻礙它的營業照常進行，譬如運輸困難或顧主付款太遲，那銀行就有權准許它在計劃所規定的另外借款。

國家銀行資產的主要來源，就是自己的財源，每年由銀行利潤百分之五十贖積而來（另外百分之五十屬於國家預算）。其次就是各經

濟企業調整賬目數額，和預算所規定銀行透支於行政機關，社會機關，及金融機關如儲蓄機關等所得。末為銀行管理一切全聯邦共和國及地方的預算之經濟收入和支出，結果它的賬單上常常保持預算需要大量的資金。至集體農場的大量發展和它們的貨幣流通量迅速的擴張，成為銀行新資產一個極多及速增的新來源。

至於負債方面，銀行付給顧主的利率二厘至四厘。因此我們上面所說的銀行放款由經濟組織的計劃所限制，因此銀行利率沒有作用，但在別的國家則為貼現率所支配。利率長期不變，銀行主要底目的作為經濟劃賬的工具而反映利率在生產成本中的地位。

工業化使蘇聯經濟運動達到蘇維埃聯邦每個角落裏，即遠處落後的北極地帶亦受了影響。實際上工業化發展經濟運動的容量，結果也就是擴展信用運動。自一九三七年正月起，蘇聯國家銀行放出款子的總數達三百五十億盧布。一九三七年又另新增信用五十九億盧布。

從法律方面言，國家銀行活動的傾向是「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總計劃」，這種動向每年由政府批准的放款計劃所規定。銀行信用計劃化事實上很便利，即每個企業——銀行的永久顧主——有它自己的財政計劃，可以預窺某一時期或某一季節需要週轉資本的擴大。而財政計劃化亦很方便，即一切信用機構均集中於唯一的國家銀行，而國家銀行亦就是各社會主義化經濟組織間劃賬的唯一的中心，這使蘇聯國家經濟很堅強的建立，并且防止信用及貨幣膨脹的惡果。蘇聯全國經濟建立於信用計劃化及貨幣流通計劃化之上，有了這一個條件，遂使蘇聯全國經濟逐步發展而永無經濟恐慌。

五 兩個五年計劃及其財政結果

一九三七年蘇聯有兩個紀念：一是蘇維埃聯邦成立二十周年紀念，二是發展蘇聯全國經濟五年計劃完成紀念（一九三三——三七），在過去幾年中，也和其他事業成功一樣，蘇聯已經創立一種和諧及強力的財政制度，切實而活躍，證明它能動員舉國的經濟財源，以促成

兩個偉大的五年計劃的實現。我們看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財政制度已集合一千二百零一億盧布。至第二個五年計劃，已三倍上述之數，其總數已達到三千五百五十五億盧布，較前計劃多至三倍。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中，兩項事實可以證明蘇聯財政制度的迅速進步和結果優良：執行財政計劃漸臻制度化，及在預算上收入超過支出。後者是財政上最重要的成功，由於下列一表，可以證明：

年 別	收 入 (單位億盧布)		支 出 (單位億盧布)	
	計劃中預測	實 收	計劃中預測	實 支
一九三三年	三九〇	四四三	五三	四四
一九三四年	五三〇	五五〇	二〇	二五
一九三五年	六九六	七一七	二一	一一
一九三六年	八三〇	八八五	五五	一八
一九三七年	一〇四〇	—	—	一〇

第二次五年計劃中之前四年，收入已超過計劃上所預計數達一百四十九億盧布，而超過實際支出達八十億盧布。

根據蘇聯通行的法令，預算剩餘不能併入下期預算，而在國家銀行開一特別賬作為國家銀行的資產。

由經驗證明這些預算的基金，在近年來曾達到執行全國經濟計劃財政來源平均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其結果有人認為五年來預算的收入總數，可以表明一切財政制度活動正確的結果。在這五年中，預算動用三千六百三十六億盧布，假如我們在這個數目上加上百分之二十五，我們就可以得到歷年執行預算大約數目的問題。這將達到四千五百億盧布，或者較五年計劃所規定的數目三千五百五十五億盧布多了百分之二十六。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方法來計算第二次五年計劃財政部分成功的可能結果。自從建立五年計劃大綱以來，把它依每年分成各段。一九

三七年亦是如此，是年財政制度的總收入在五年計劃中已決定八百四十億盧布，所以一九三五年財政計劃參照過去幾年所執行的經費，據報告為一千三百七十九億盧布，約增加五百二十九億盧布。

五年計劃中所謂將來國家經濟與財政的發展必須首先配合，雙方均係重要和必需，因為每年建立實際計劃就有一個綱領，彼此可互相接續，按步進行。兩者配合的計劃遂使其在切實執行工作時漸趨完善。每年實際計劃，當執行國家經濟各部門如工廠等，應顧及它有新的可能性。我們再詳細說，一九三七年執行財政計劃所多餘的五百三十億盧布正合乎五年計劃所預定的數字，其中四百九十七億盧布來自社會主義經濟蓄積的基金。這點清楚表示補助收入的來源，由此證明蘇聯財政的成功幾完全由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而吸收大部國民所得的緣故。

六 戰爭前夕之財政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蘇聯財政制度在一九三七年動用一千三百六十九億盧布以實現國家經濟總計劃，較一九三六年計超出二百八十二億盧布。在一千三百六十九億盧布中，國家預算供給一千零四十一億盧布（佔百分之七六）。又一千三百六十九億盧布總數中，主要包括社會主義經濟事業的蓄積金（一千一百四十八億盧布，或佔百分之八三・八），償還基金五十八億盧布（百分之四・三），人民直接所納之賦稅，國家公債收入，儲蓄金，保險費等為一百二十七億盧布（百分之九・三），最後其他收入為三十六億盧布（百分之二・六）。

社會主義化經濟組織之蓄積金所佔的地位，在一切收入來源的總數中漸漸增高，一九三六年佔百分之八一・四，在一九三七年增加來源總數二百八十二億中，有二百六十三億是由社會主義經濟組織所蓄積。這是現在蘇聯財政制度最特別之處。另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我們觀察提取所得稅後的資金蓄積和屬於總清賬中的盈利，步調不一致。一九三六年，營業稅的總收入較上年增加百分之一六・六（由四